

维特档案

第一卷(下)

——访问记 笔记

ИЗ АРХИВА С. Ю. 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ссказы 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Ручкописные заметки

[俄] 谢·尤·维特 / 著

李 晶 杨怀玉 / 译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李玉贞 / 审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维特档案

第一卷（下）

——访问记 笔记

〔俄〕谢·尤·维特 / 著

李 晶 杨怀玉 / 译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李玉贞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ИЗ АРХИВА С.Ю.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ссказы 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Рукописные заметки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С.-Петербург 2003

本书根据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2003年版译出



目 录 Contents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	1
维特夫人的序言·····	1

第一卷（上）

第一章·····	3
第二章·····	60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71
第五章·····	223
第六章·····	279
第七章·····	334
第八章·····	385
第九章·····	445
第十章·····	507
第十一章·····	569

第一卷（下）

第十二章·····	627
-----------	-----

第十三章	708
第十四章	777
第十五章	850
第十六章	911
第十七章	981
附录一	1087
附录二	1092

第二卷

前言	1133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07 年 6 月	1135
汉堡 1907 年 6 月	1147
汉堡 1907 年 6 月	1192
凯特勒赫 (Catleret, 法国) 1907 年 8 月	1245
比亚里茨 1907 年 8 月 (俄历)	1285
比亚里茨 1907 年 9 月	1305
彼得堡 1908 年 1 月	1389
维希 1908 年 8 月	1424
维希 1909 年 7 月 19 日	1433
比亚里茨 1909 年 8 月	1453
比亚里茨 1909 年 9 月	1508
维希 1910 年 7 月 11 日	1542
萨尔茨施利尔夫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附近) 1911 年 6 月	1613



比亚里茨 1911 年 8 月	1624
萨尔茨施利尔夫 1912 年 7 月 14 日	1646
比亚里茨 1912 年 8 月 25 日	1711
人物简介	1759

第一卷（下）

第十二章

1912 年 1 月 12 日

(第 3 次)

农民问题和贵族问题

废除农民赎买份地和离开村社的法令，将此事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统治后期，内政大臣提出了停止实施农民赎买条例的问题，根据这一条例，农民只要遵守某些条件，就有权买到自己的份地。由于土地购买金逐年减少，所以到 1880 年年底已经有许多农民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买到自己的份地了。

由于这个赎买办法是在 1860 年颁布的赎买条例中宣布的，后来没有再做任何调整，分地不是循序渐进，也未经慎重考虑，结果损害了其他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实行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时候。因此，内政大臣提出了停止实行该条例的问题，根据当时的理解，这就等同于取消这一条例。

内政部，特别是在托尔斯泰主持时期和他以前的时期，醉心于村社制度。遗憾的是，对村社的这种向往，与其说是出于农业方面的考虑，毋宁说是出于警察角度的考虑。因为，毫无疑问，管理家

畜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它们组成畜群，换言之，亦即在成群豢养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管理。村社在他们看来就是由人而不是动物构成的畜群，这种人是一群特殊的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与贵族有着天壤之别。德高望重的尼古拉·赫里斯蒂安诺维奇·本格对此表示反对。

这样一来，从这个条例中又派生出另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村社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孰优孰劣，这是一个异常尖锐、非常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国务会议各组对此问题发生了分歧，于是就必须把问题提交国务会议全体会议进行讨论。我作为财政大臣必须对此问题说出十分明确的看法。

应当说，当时我一方面尚未充分研究农民问题，对于哪种土地所有制具有相对优越性的问题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观点；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我支持农民个人占有土地的制度，即承认这种方式具有优越性，那么就应该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来实施这种制度，应当为此制定某些明确的规则，仅仅说每一个农民都有权赎买土地是不够的。必须详细指出和明确规定迄今尚不清晰和规定得不够明确的全部赎买条件。

既然如此，鉴于有人反对村社制，我认为必须摆出设想中的实行村社制的有利之处。我说，村社无论如何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因此，如果不从整体上解决全部农民问题，就无法单独解决分地的问题。

这样，我既没有完全表示支持村社，也没有完全表示支持私人土地占有制，而是提出：在从整体上澄清和研究农民问题之前，停止实施分地条例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把问题提交国务会议全体会议讨论的那一天，我正好要向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奏报，但是皇上没有向我谈起这个问题。奏报和就餐之后，我乘车来到火车站（当时皇上住在加特契纳宫），坐上火车后，我发现车上挂了一节专列，年轻的皇太子尼古拉走进了这节车



厢。皇太子请我到他的车厢里去，我们一起前往彼得堡，皇太子详细询问我主张如何解决问题，支持哪种观点。显然他事先没有考虑也不了解这件事情，但却受了尼古拉·赫里斯蒂安诺维奇·本格的影响，后者是力主要求内政大臣否决这一问题的。

我启奏殿下说，我持另一种观点，由于问题还不明确，我认为最好暂时停止实施分地条例，但必须着手研究农民问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从整体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

最后，在国务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同意了我的意见。

皇太子是如何表态的，我不清楚。不过我和皇太子同乘一节车厢并就农民问题谈论了很久，我发现殿下诚恳、仁慈，他对农民的利益极为关切，认为他们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虽然国务会议表示必须着手彻底解决整个农民问题，并将其委托给与此事密切相关的几个大臣、主要是内政大臣，但事情当然还是停顿下来。

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 1893 ~ 1897 年工作的第一份总结报告 我试图结合移民问题提出农民问题 1898 年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提出了 1893 ~ 1897 年的第一份工作报告。

由于尼古拉二世皇帝一直担任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主席职务（他是皇太子的时候就担任此职，继位后仍然保留了这一职务），所以这份报告具有特殊的意义。

农民问题和移民问题的状况以及皇上在统治初期和后期对农民问题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位年轻皇太子性格上最明显的特点，即必须指出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成立之初皇太子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的，后来（让我继续讲下去）这种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观点而是情绪，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尽管人们可能不大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早在 1893 年，即大约 20 年前，由于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我提出了移民的问题，也就是无地的农民可以迁往远东，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及其向我们太平

洋沿岸地区的延伸，他们可以在西伯利亚荒漠上定居。这一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甚至有点近乎革命的色彩。

政府中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彼得堡最有势力的人士都认为，这个主张，也就是让农民离开欧俄到西伯利亚寻找更好的生活，简直是荒谬绝伦。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这一措施将提高在地主领地上种地的劳动成本，因而对所有地主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它可能激发农民对自由的向往，而地主们认为，自由不仅对他们，即对我们的贵族有害，而且就是对农民自身也是有害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时的内政大臣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对此就持反对意见，不过他采取的是隐蔽的形式。但我的意见得到了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本格的支持。我不知道是由于受他的影响，还是出自本人内心的愿望，年轻的皇太子尼古拉竟坚决主张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允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那些在欧俄地区难以谋生的农民迁往西伯利亚边陲的问题。

然而，尽管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内政部仍然继续阻挠，特别是在初期。当然它的态度只是因为担心这种移民可能会抬高农业劳动力的价格。直到几年之后，才或多或少允许比较自由地向那里移民，而最近若干年，也就是在我们饱尝混乱之苦的时期，则已经开始把这种移民作为平息农民骚乱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1893年的时候，年轻的皇太子尼古拉是怀着他从前所特有的那种诚挚的感情来对待农民利益问题的。

不到一年，皇太子登基了。当时我曾经以为，现在应该是对俄国农民采取更为公正、更为关怀态度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应该是采取伟大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60年代宣布并已实行了一半的那种态度的时候了。然而，十分明显，那些不同意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改革的势力，唆使年轻的皇帝对此产生了怀疑。

可能，尼古拉皇帝继位后，这些怀疑加深了。地方自治机关和



贵族的代表团纷至沓来，到冬宫觐见皇上，其中有些代表团表示的愿望与1905年10月17日实现的愿望雷同，直至今日它不仅是所有宫廷人士关注的大事，不仅是大多数国务会议成员的夙愿，而且也是无原则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孜孜以求的目标。

我个人认为，这些代表团当时的意见不够得体，作为公众代表，表达愿望时应该更加审慎，特别是在年轻的皇帝刚刚继位，尚不能深思熟虑地考虑问题的时候。内政大臣杜尔诺沃利用了公众代表们这种不得体的言论，可能也有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对陛下的影响：皇上在一次非常庄严的谕旨中竟然稍提了提这些“胡思乱想”，现在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些“胡思乱想”了，因为不论对俄国是祸是福，这些“幻想”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已不再是幻想了。^①

① 维特对1895年1月17日尼古拉二世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说时言论的引用不够准确。当时沙皇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们说：“最近，在某些地方自治机关中有人热衷于让其代表参与内政管理，这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幻想。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要把所有的力量都贡献给人民的福利事业，我要像慈祥的先父皇一样，坚定地毫不动摇地维护专制制度”。

“缺乏理智的幻想”这一不恰当的词语，引起了误会。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沙皇只是口误，因此开始寻找相应的替代词汇——“空洞的”“无益的”等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尼古拉二世亲自做了标记的演讲稿中，使用的就是“胡思乱想”这个词（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919，目录2，案卷609）。沙皇的演说稿是由波别多诺斯采夫起草的，在他的草稿中写的是“胡思乱想”（不知道波别多诺斯采夫呈递给沙皇的原件是否保存了下来，但他把稿子的副本放在了给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的信中，并告诉亲王说沙皇拿走了稿子，“未置可否，只是将它收下了”。见：波别多诺斯采夫致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的信，1895年1月12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253，第29包，第2号，第17~18页）。尼古拉二世用一个更荒唐的词语代替了师父不妥当的词语，看来他是想以此表明自己的独立性，表明自己是不依赖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因为无论是宫廷人士、政府层面的人士，还是社会各界都知道波别多诺斯采夫对年轻的沙皇有着很大的影响（见Ю. Б. 索洛维约夫《尼古拉二世执政初期和波别多诺斯采夫在决定专制制度政策方针中的作用》，《1972年古文献学年刊》，莫斯科，1976，第311~318页）。

尼古拉皇帝登基后，我曾多次向皇上禀报，并同时在财政大臣关于国家预算决算的年度奏章中也多次提到必须彻底研究农民问题（这种奏章在当时，在我们的最高立法机构改组之前，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因为只要稍加考虑，用不着有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懂得：一方面，俄罗斯帝国的未来实际上完全取决于农民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处置不当，草率行事，它就会成为各种暴乱和国家动荡的根源。

贵族委员会

委员会的设立及其成员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1895 年召开的会议不是讨论农民问题，而是讨论贵族问题也就是所谓“贵族委员会”会议。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干事长是斯季申斯基，他是托尔斯泰伯爵任内政大臣时的办公厅主任帕祖欣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而托尔斯泰伯爵在 80 年代曾执行了一系列极端反动的法律，例如地方自治条例法、农民自治会长官法等等。这些法律不仅违背了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改革的精神，而且给这次改革本身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

从贵族委员会成员的构成情况也明显可以看出，其设立的目的不是要提高平民百姓的福利，而是要为那些土地私有者、主要是为我们那些负有债务但受到人为支持的贵族谋福利。

我的观点：贵族的福利取决于农民 我作为财政大臣，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该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如果农民的状况不好，对贵族也没有好处；反过来，随着农民状况的好转，大多数贵族也会得益更多。所以我认为，贵族委员会主要应该注意提高农民福利，应优先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我阐述了这种思想之后，会议主席宣布休会，说他要就这个问题请示陛下。



皇上规定^①委员会活动的范围和任务 复会后，杜尔诺沃宣读了陛下的圣旨：皇帝陛下恩准设立贵族委员会是为了设法改善俄国贵族的处境，而不是改善农民的状况，因此贵族委员会不应当涉及和探讨农民问题。

人为恢复贵族福利状况的打算和我对此事的反对 不言而喻，这样的决定本身就等于给贵族委员会判了死刑。这个委员会成立若干年了，尽管绞尽脑汁地试图人为恢复一个已经孱弱不堪、奄奄待毙的肌体的健康，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因为这个委员会试图通过国库也就是用人民的血汗钱来充盈贵族的腰包，其做法屡试屡衰，每次都遭到我的抵制。

尽管大多数人反对我，只有某些委员支持我，但我依然在所有问题上都把贵族们想向国库伸手的不光彩意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尽管他们对我恨之入骨，但是委员会成员们毕竟还有羞耻感，还不敢贸然攫取人民的钱财。

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无疑都保存在档案馆中，很可能保存在国务会议的档案库里。虽然，这些会议记录是斯季申斯基编写的，没有反映出委员会中发生争执的真相，但仍然被藏了起来，因为它同俄国190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和发生的事件大相径庭。所以，如果这份记录公之于众的话，那么连第三届国家杜马也会发现一个意料不到的现象：古奇科夫和鲍布林斯基伯爵应该感到羞愧才是。

我上面提到，贵族委员会最后草草收场，什么也没做成，只是给了土地私有者，主要是那些出身于俄国没落贵族家庭的土地私有者一些小小的甜头。

谈到俄国贵族，我有责任重申：我本人也是世袭贵族，我的祖先中也有不少历来就是名门望族。我知道也有不少贵族情操高尚、并不自私，他们具有每个真正贵族应有的品质：关心弱者和同情人民。

^① 代替删掉的“限定”一词。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全部伟大改革都是由一小批贵族来进行的，而这样做在当时并不符合大多数贵族的心愿。现在也是一样，有相当多的贵族并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和人民的福利分开，他们不顾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行动来探索达到全民福利的途径，尽管这样做有时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会危及自己的生命。遗憾的是，这样的贵族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贵族从国家的角度看乃是一撮蜕化变质者，他们除了一己私利，除了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外，别无他图，因此竭尽全力用人民的钱谋求种种恩惠，而这些钱都是从最贫苦的俄国人民那里收来的，是为国家造福的，而不是供这些蜕化贵族们私人享用的。

皇上在国务监察大臣关于居民支付能力紧张奏章上的御批 我试图唤起大臣委员会研究农民问题

1898 年大臣委员会审议了国务监察部 1896 年的报告。国务监察部的报告提到，“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十分紧张”，皇帝陛下批示道：“我也这样认为。”这使我有理由在大臣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必须研究农民状况、把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 60 年代创始但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的问题。我建议为此设立一个享有专权的专门委员会，它可以参照 60 年代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来研究农民问题。

4 月 28 日和 5 月 5 日大臣委员会举行两次会议讨论了国务监察大臣的报告，并结合大臣们就此提出的种种意见主要研究了国务监察大臣间接提到的农民问题，以及我就此提出的关于设立委员会的设想。

大臣委员会关于必须研究农民问题的决议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我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大臣委员会决



定：“为了审议关于补充和发展农业状况的立法问题，成立一个专门会议，主席由皇帝陛下任命，成员包括内政大臣、司法大臣、财政大臣、农业大臣和国家财产大臣以及陛下特别指派的担任国家高级职员的其他人员。”下面两条涉及的是该委员会的工作安排问题，第四条指出：“这个专门委员会应将所做结论提交陛下钦定。”

皇上未批准大臣委员会的决议

皇帝陛下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否定大臣委员会的这个决议，下旨说：“现将大臣委员会记录保留不动，大臣委员会主席应于今秋奏请陛下指示此事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显然陛下又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我以及支持我的大多数大臣委员会委员主张设立这一专门委员会；另一方面是大臣委员会主席杜尔诺沃的影响，他当时已经担任大臣委员会主席，原来曾经担任内政大臣和贵族委员会主席，而这一贵族委员会是那些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了由鲍布林斯基伯爵任主席的所谓“联合贵族”委员会势力的喉舌。这些贵族一贯把农民视为某种近乎人和牛中间的东西。这也正是波兰贵族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他们一向把农民看成自己的役畜，而我觉得，波兰王国之所以多次遭受被邻国瓜分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波兰贵族对人民的这种态度造成的。

这样一来，成立农民委员会的问题又被冻结了，不过并没有完全被取消，一切都将取决于皇上秋天从克里木回来后对设立农民委员会一事的态度。

我向皇上呈递关于迫切需要从整体上 调整农民地位和农民事务的信

有鉴于此，我认为必须就此问题给在克里木的皇上写一封亲笔